

揩公家油养私家车，新型“车腐”须警惕

“私车公养本质上还是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表现，是四风问题的反弹回潮。”

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事后自我剖析称，没有公车坐了，用私家车办公事存在补偿心理，就利用工作便利换取补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翟永冠、向定杰、梁建强

近日，湖南益阳市纪委通报4起私车公养案例，贵州省纪委3月19日通报了1起私车公养案例，天津、湖北、浙江等多地也在持续开展私车公养专项检查整治。从中央纪委以及各地纪委通报情况来看，此类案例并不少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各地作风建设持续深入，公车私用得到有效遏制，但花样翻新的私车公养现象浮出水面，成为“车轮腐败”新变种。

变着花样“揩公家油”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养，一些地方公车改革过程中的违纪问题出现新动向。记者调查发现，私车公养的表现形式多样。

其中，使用单位加油卡为私家车加油的案例最为普遍。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3月19日通报了贵阳市乌当区爱卫办主任韩云贤私车公养问题。2016年至2017年，韩云贤在前往广州、海南、凯里、重庆等地办私事过程中，多次违规使用单位公务油卡为私车加油，共计20314元。2017年12月，韩云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费用予以退赔。

湖南益阳市纪委的通报显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30日，赫山区水务局公车驾驶员苏建私自用公务车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加油19次共计5300余元；该局公车驾驶员陈运良私自用公务车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加油26次，为朋友私车加油2次，合计7400余元。苏建、陈

虽然大批“散户”退出，全国生猪均价又跌至近4年最低，山东养猪大县养一头猪亏260多元

破解“猪周期”，要“规模化”更要“高质量”

2014年猪价低迷，淘汰了大量散户，一些规模化养殖企业借机扩张、抢占市场份额，近年投资力度比较大，形成的产能正逐步释放

未来种养业需在规模化进程、种养结合、建设大数据体系、建立多元化销售渠道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供需有序调整，平抑价格大起大落的“阵痛”

本报记者陈国峰、邵鲁文、邵琨

全国均价跌至近4年最低值，当前价格较年初降了1/4且尚未探底，山东地区价格连续8周走低，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诸城养殖户一头猪亏260多元……近期，生猪价格一路“跌跌不休”，又让人不禁担心“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猪周期”是否正卷土重来。

如今规模化养殖水平不断提高，环保整治淘汰了大批猪场，为啥猪价反而跌破成本线？破解猪价涨跌怪圈有何良策？《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现状：养一头猪亏260多元，猪价跌至近4年最低谷

“料到了猪价会降，但没想到会跌破5元！”山东诸城昌城镇杨义庄村民陈金峰从事养猪行当已有十几年。据他回忆，上次生猪价格低于5元/斤是在2014年前后，低迷的行情一直持续到2015年，随后迎来一波涨势，到2016年一斤最高涨至10元左右，2017年初开始一路下滑到现在的低价。

猪价处在波峰时，陈金峰主动减少了母猪存栏量以应对预料中的价格回落。但目前的价格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去年的环保整治关停了一大批养殖户，本以为能对猪价形成对冲，不至于跌得太狠”。

运良被立案审查，该局负责公车管理的原党组成员向新颜被提醒谈话。

还有的人将私车“租”给单位。湖北纪检监察机关近期通报，2016年全年，恩施市板桥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廖雪峰将一辆私人小轿车“租给”中心使用，用于自己进城开会和下乡，并报销“租车费”。查实后，廖雪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也有的人把私家车加油、保养等费用一并入账报销。浙江温州纪委近期通报，2017年底，苍南县委第一综合巡察组对苍南县旅游投资集团开展巡察，发现该集团渔寮分公司的会计账册中出现非公车产生的车辆保养费等。经核查，该分公司经理杨守文和副经理赖联云、陈礼施，将自己私家车的油费和保养费入账报销。自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间，3人在公司账户累计报销私家车油费及车辆保养费共14505元。鉴于3人在案发前主动整改并退出违纪款，2018年2月，苍南县纪委分别给予杨守文等3人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奢靡享乐歪风出现一些新动向新表现，其中就包括通过违规借用下属单位或企业车辆等方式使用公务用车，甚至变公车私用为私车公养。

多地整治查处，暴露公车管理机制不完善

针对出现的这些现象，多地开展了私车公养专项检查整治。如贵阳从去年开始开展公务加油卡专项整治，截至今年1月底，共检查单位（部门）1090家，清查5679张公务加油卡（含副卡），发现问题115个，立案50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9人。

多地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管理机制不完善为私车公养歪风留下了生存空间。

——加油卡管理粗放。目前不少单位公车用油都采取“充卡加油”的方式，多是用一次大额充值的发票报账，但具体加油次数、车辆、行程等则没有明细，少数人员就在加油卡上动起了“歪脑筋”。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国土资源局一名领导干部的驾驶员，私自将单位公务加油卡拿给他的妻子使用，加油66次，开支17900余元。

此外，一些单位指定了加油站点，统一结算油费，也让私车“揩油”有机可乘。

——公车使用登记手续不全。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单位的公车使用流程虽然有详细规定，但执行中为了省事图便利，往往流于形式。当需要私车公用时，也没有专门的台账进行登记，对出差事由、行驶里程等情况没有记载，多数情况



下只是口头请示，让私车公养有了自由操作的模糊地带。

——发票报销存漏洞。“确实存在没有好好审核的问题。”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常委邹云森说，少数公务人员将私车私用中产生的油费、维修费、过路费、罚款等捆绑在公车身上一起报销，单位的领导和财务部门没有严格把关。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近期通报，2018年1月，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区司法局某领导的私家车维修费用由办公室副主任冯某某经手予以公款报销。经过查对账目，比对单据，发现冯某某将假单与旧签名复印在一起伪造单据，造假报销。

堵住“跑冒滴漏”，扎紧制度笼子

“私车公养本质上还是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表现，是四风问题的反弹回潮。”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高波认为，一些人钻制度空子，以权谋私，消解了公车改革的效果，同时也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事后自

我剖析称，没有公车坐了，用私家车办公事存在补偿心理，就利用工作便利换取补贴。

高波表示，现实中确实存在公车不够用、私车公用的情况，但这不是违法违纪的理由，不能以此为借口为私车公养开脱。

多名受访党员干部认为，遏制私车公养，要强化制度建设和落实，加强监督，强化问责。邹云森等建议，严明公务用车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现私车公养问题，除处理直接责任人外，还要对负责管理公车的人员以及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震慑。”

据了解，不少地方开始借助互联网技术，紧盯公务加油卡，实行网络信息监管，让每一笔用油消费的去向都有迹可循。比如湖北省沙洋县纪检机关利用公务油卡管理系统、加油站监控系统、公安“天眼”系统等信息大数据进行比对，精准获取问题线索，从严快查快处，取得明显成效。

高波等专家认为，解决私车公养问题，还要融入到公车改革的大盘子中，简化购买社会服务流程，增加供给，让公务用车更规范、更便利。

新华社天津3月29日电

本报记者字强

“到2020年，各地要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既定目标之一。记者调查发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过程中，百姓看病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基层出现了“接不住”“落地难”的窘境，存在“签而不约”“签而难约”问题。

作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安排，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托底基层医疗面临医生不足、资源短缺等困难。

方便省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缓解看病难

今年53岁的云南昆明市武成社区居民刘云燕是一位中医迷，她2016年就开始与武成社区服务站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定期到社区服务站接受中医诊疗。平时有个感冒发烧等小病，或者需要转到大医院住院，她都会找家庭医生寻求帮助。

像刘云燕一样，越来越多的居民有了“家庭医生”。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云南省家庭医生签约率达43.34%，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1.32%。

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医生签约，是一种基层特有的医疗服务项目，其基本医疗服务涵盖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路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服务主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全科医生（含助理全科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以及具备资质的乡镇卫生院医生和乡村医生等。

“家庭医生并不是直接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的私人医生，但只要签约，我们都会定期深入村民家中，调查了解村民需求，明确服务内容及标准，为他们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今年38岁的杨连英已在云南省屏边县新华乡河南村干了10年乡村医生。她承担着河南村2000多名常住村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去年以来，她给全村居民都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挨家挨户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全村一半以上村民都签了协议，其中8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杨连英会定期给签约村民做免费体检，还提供咨询、转诊服务。

“签而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难

“推广家庭医生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西北大学副教授霍绍果说，我国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政策安排。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但在实际工作中，家庭医生“签而难约”“一人签约近千名社区住户，签完之后再无联系”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城乡居民对家庭医生政策知晓度低，一些已经签约的城乡居民不知道该怎么用好家庭医生。

记者走访基层发现，一定数量的居民与社区服务站或村卫生室签订过家庭医生协议，但仅仅只是签约，难以实际享受服务。群众反映：“有的时候找不到签约家庭医生，咨询求助得不到回复。”

较高的签约率是怎么来的？记者了解到，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生一般都会在患者前来看病时，引导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而很多患者对签约内容和服务条款并不熟悉。

“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我们得挨家挨户与全村的居民签订协议。”昆明市五华区一位全科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承担着全村1000多名村民的基本公共卫生任务，要与每一个家庭签订协议，任务非常重。

“平时主要是坐诊，没有精力入户调查、服务，除非是空巢老人或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我们会定期随访。”这名医生说，签约村民都有健康档案，但也有不少“僵尸档案”，有的档案基本信息不全，甚至只有一个名字。

强基层、补短板，促进家庭医生“签而有约”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难反映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的现状，政策设计不完善，全科医生不足，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目前我国社区、乡村医生的配比是不够的，基层医生整体服务能力不强，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

朱恒鹏认为，应该加大全科医学生培养力度，给家庭医生就业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全科医学生、公立医院专科医师等更多医务工作者加入签约行列；重点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实施绩效工资、职称晋升改革，提高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性；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实现医疗数据资源共享与远程医疗服务。

针对“签而不约”“僵尸档案”问题，专家建议，可开发统一的家庭医生签约信息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搭建医生和签约居民之间的互信关系，双方可以通过平台方便快捷地查询、评价、沟通。

“长期而言，需要完善政策部署和相关立法。”霍绍果说，家庭医生走进基层，留在基层关键需要赋予其与工作内容、要求、目标相匹配的治疗权、费用控制权等，明确家庭医生在医疗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激励家庭医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

朱恒鹏说，还可借鉴国外经验，逐步放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市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鼓励企业参与基层医疗事业。